

青年群体金融素养的时代特征 与异质性探究

■ 陆杰华 张伊杨 李乐知

[摘要]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型业态，在扩大金融普惠程度的同时，也对社会大众的金融素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重点关注数字时代下占据可能优势的青年群体，对这一群体金融素养情况进行探究，并依据比较性与异质性视角展开具体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金融素养水平上，青年群体普遍优于其他群体，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青年群体内部的Y世代优于Z世代；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情况受到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年龄较大、性别为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非农户口、居于东部地区、从事金融相关职业等情况均会对提升金融素养产生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将提升金融素养纳入政策范围，从制度层面强化公众的金融意识，完善课堂内外的金融教育，与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实现有效互惠；青年群体还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普惠金融的有效发展。

[关键词] 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数字金融；金融教育；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2)00-0000-14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我国金融市场改革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日益丰富，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更催生出了数字金融的新型业态。毋庸置疑，数字金融不仅有力促进了整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还突破了传统金融的发展瓶颈，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该领域潜在的技术排他性与风险威胁性，也对人们掌握金融知识、处理金融事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需要较高水平的金融素养与之匹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区域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及其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8BRK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杰华，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老龄健康；张伊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李乐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立足于数字时代，金融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多重维度对各种金融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就对融资行为的影响而言，金融素养有助于人们对信贷需求、正规金融程序等形成基本认知，促进金融服务提供方与需求方的信息对称，避免造成信贷约束或正规金融排斥。同时，金融素养较高的群体更倾向于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借贷，而金融素养的缺失极易导致高利息借贷等非理性借贷行为，最终造成过度负债等金融困境。另一方面，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来看，金融素养有利于人们增加股票等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度、扩大投资规模、优化资产配置，最终提高家庭财富的增值效率。此外，准确的投资信息判断与高效的财务管理技能也有利于提高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显著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

既往文献显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金融素养缺乏的现象，长此以往将对国家金融市场的安全秩序与稳定发展造成威胁。以中国为例，《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指出中国消费者的金融素养虽已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但仍需进一步的知识补齐与技能增强^[1]。而在此之中，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更是备受关注。一方面，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是一个国家创造力与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聚焦于金融领域，该群体金融素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国家未来金融发展的宽度与深度。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拥有较强的学习技能与风险承受能力，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高，在当下技术支撑的数字时代与复杂多元的金融环境中，青年或许可以成为金融教育普遍推行的重要切入点与数字金融蓬勃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对于当下青年群体金融素养特点及其差异性探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聚焦于1980年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借助独立样本t检验、因子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全方位探究数字时代下其金融素养的主要特征及内部的异质性情况。

二、相关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一）金融素养的概念界定

金融素养这一词汇在学术研究中出现得较晚，迄今为止学界仍未形成对其统一定义，但综合既往研究，其概念界定大致可划归为两重路径的发展：一是从单一化理解到综合性概念的内涵拓展，二是金融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理念延伸。

从金融素养的概念内涵来看，早期研究偏重对金融知识的单一强调和局限理解，然而随着人们对其认知逐渐深入，学者开始超越金融知识的狭义范畴，综合金融素养内含的多重维度进行整体性考量。卢萨迪（Lusardi）和米切尔（Mitchel）认为金融素养是综合性概念，意指在财务规划、财富积累等方面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2]，刘国强也将金融素养理解为掌握金融知识、有效管理个人资金、处理个人金融事务的能力^[3]，朱涛等认为金融素养可以包括金融知识与决策技能两个方面^[4]，而廖理等进一步指出金融素养是消费者具备的金融知识、态度、行为和技能的综合^[5]。从金融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坎贝尔（Campbell）将金融素养视为包含知识和技能的专项人力资本^[6]，胡振和臧日宏也认为金融素养是个体得以有效管理其金融资源的重要人力资本^[7]，不

仅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金融决策，而且对个体发展诸方面均具有深刻影响。

综合上述文献中的多重理解，重点参考刘国强等人的相关定义，本文将金融素养界定为个体处理金融事务的坚实理论支撑和管理金融资源的重要人力资本，其主要包含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四重维度的内容。

（二）影响金融素养的主要因素

金融素养作为内含多重维度的综合概念，其实际水平也将受到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结合前人的分类探讨与系统研究，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大致可分为个体和社会两个方面。

个体因素主要指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经济工作背景等基本要素。就人口统计特征而言，金融素养受年龄、性别、婚姻、学历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大。总体上看，学界对于年龄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德拉万（Delavand）等人认为金融素养随时间增加得到提升^[8]，而阿格沃尔（Agarwal）等则发现金融素养和年龄之间呈倒“U”形的关系^[9]。在性别方面，既往研究普遍认为男性的金融素养比女性的金融素养更好^[10-11]。就婚姻状况而言，多莉娅娜（Doriana）等发现已婚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比离异或单身居民更高^[12]，凯希艾因（Kehiaian）也发现在负债人群中已婚人士的金融素养更高^[13]。学历也是影响金融素养的关键因素，金融素养水平与学历情况呈正相关，卢萨尔迪（Lusardi）等也发现教育程度较低者相较于其他群体，其金融素养更为缺乏^[14]。

就经济工作背景而言，户口类型、收入情况、职业类型也会对金融素养情况产生显著影响。户口类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既往研究普遍表明城镇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比农村居民更高^[15]。在收入情况上，斯帕塔罗（Spataro）和柯西尼（Corsini）发现收入对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关于工作性质影响的讨论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在职者比失业者的金融素养水平更高，且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的从业经历也对金融素养提升具有推动作用^[17]。

社会因素则主要包括家庭情况、网络平台等要素。家庭教育会对孩子的金融素养产生重要影响^[18]，能够帮助子女更好地认知金融概念、开展金融行为，并形成一种代际传递效应。此外，卡拉（Kara）等发现在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上的信息获取有助于居民高级金融素养的提升^[19]，索思（Sohn）等立足于韩国社会场域，也指出媒体和网络是影响该国青少年金融素养的主要社会化代理人^[20]。

（三）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

国内外聚焦于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围绕青年遭遇金融风险 and 大学生金融素养缺乏这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周晓春等认为在社会金融化、数字化的迅速发展下，非正规金融产品进入青年群体的可能性加大^[21]，缺乏金融能力的青年人极易遭受金融风险。而就后者而言，一些研究着眼于青年中的大学生群体，例如阮瑞草等基于东南大学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金融素养虽然总体水平尚可，但仍有超过20%的大学生金融素养得分明显偏低^[22]，高远等也指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在金融知识、技能等方面仍有不足^[23]。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大学生金融素养不足的总体情况。

综前所述，现有文献已从多重维度对金融素养进行探讨，形成了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论述框架。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结论，结合当下社会的现实境况，我们提出下列三个研究假设，试图对其予以回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既往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不足。

假设1：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比其他群体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高。

假设2：Y世代群体金融素养水平比Z世代群体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高。

假设3：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明显的内部异质性，其中受到性别、年龄、户口类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该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PPS）及重点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收集了中国家庭在金融知识等多方面的高质量数据，其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355个区县、1428个社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数据筛选上，原样本规模为40011户家庭，由于研究所涉及的部分题项缺失值占比较高，难以顺利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针对问卷中仅对新受访户提问且同时出现在2015年CHFS问卷中的问题，将其对应的2015年部分数据补充到2017年的数据中，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由于抽样方法选择导致的样本缺失，最终样本量仍为40011。

（二）变量设计

1. 核心变量

（1）金融素养

既往研究中对金融素养的衡量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倾向。第一种是将其区分为主观金融素养和客观金融素养的二维属性；第二种是从基本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这两重层面进行区分；第三种则不对主观与客观、基本与高级进行严格区分，而是依据金融素养内含的多重维度，分别对应相关问题，以此构造整体性的测度框架。

结合前人研究，我们借鉴刘国强和杨柳的处理方法，从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这四个维度，对金融素养进行整体性考量，并参考既往文献中关于这四方面的内涵论述及测度方式，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中筛选出对应的29个题目，进行必要的变量调整与赋值处理，为后续的具体分析提供基础。同时，为进一步形成对金融素养的整体认知，我们试图借助题项筛选和因子分析，针对剩余共20个题目及其对应变量，重新构造金融素养的综合指标。

表1 金融素养的整体测度框架

分类	变量
金融知识	100元年利4%本息计算
	年利5%通胀3%百元存一年后价值
	股票基金风险比较
	受访者是否认为投资多种金融资产风险小于投资一种金融资产

(续上表)

	持有多少只股票
	拥有债券类型
	基金类型
金融技能	拥有的其他金融产品
	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渠道
	购买基金渠道
	关注财经新闻渠道
	开通股票账户之后, 是否有炒股经历
	您家是否是您在炒股
金融行为	是否有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股票
	是否持有基金
	目前您家是否有金融理财产品
	财经信息关注度
	是否同意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说法
金融态度	投资风险收益选择
	两类彩票选择

(2) 出生队列

出生队列是本研究的一个核心变量。在金融素养的比较分析中, 我们将依托其进行不同群体的类别划分, 分别探究青年群体和其他群体、青年群体内部的Y世代与Z世代在金融素养方面的情况。结合名词定义与文献阐释, 本文中的青年意指在1980年及其之后出生的群体, 其他群体则指在1980年之前出生的群体。Y世代是指1980年至1994年出生的群体, Z世代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群^[24]。

2. 其他变量

综合前人研究和问卷设置, 本文将选取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所在地区、婚姻情况、所在行业、单位类型这些变量, 对应问卷中的相关题目进行赋值处理, 以便后续展开青年群体内部金融素养的异质性分析。

表2 变量的设置情况

变量名	对应问题	赋值设置
年龄	出生年	年龄=2017(调查年份)-出生年份
性别	性别	二分虚拟变量, 男性为1, 女性为0

(续上表)

教育年限	文化程度	依据文化程度,本人受教育年数赋值如下:没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职高/中专)=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9
户口类型	户口类型	二分虚拟变量,非农户口为1,农业户口为0
所在地区	现居省份	依据所在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以东部为参照组设置虚拟变量
婚姻情况	婚姻情况	二分虚拟变量,处于婚姻状态为1,不处于婚姻状态为0
所在行业	工作所属行业	二分虚拟变量,与金融相关职业为1,其他职业为0
单位类型	工作单位类型	无职业为参照组,其他依次按照选项序号设置虚拟变量

(三) 分析策略

首先,本文分别对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内部的Y世代与Z世代在和金融素养相关的29个指标上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测量在每一个金融素养指标上,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为之后的因子分析提供正当性基础。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针对去除缺省值占比较高的指标和去除各项指标缺省值后的17147个样本,先使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KMO检验对比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经检验KMO值为0.73,证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其次,在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这一维度上进行主成分分析,总共提取出7个公共因子,并进行因子旋转以预测因子得分。通过预测而得的因子得分计算每一个样本的综合得分,以此作为金融素养的虚拟指标,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判断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Y世代与Z世代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为进一步探究青年群体内部金融素养的异质性情况,我们将以表1中的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所在地区、婚姻情况、所在行业、单位类型这些变量为自变量,以因子分析构造的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整体指标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并根据回归结果分析前述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情况及具体的作用机制。

$$F = \beta_0 + \beta_1 age + \beta_2 gender + \beta_3 edutime + \beta_4 hukou + \beta_5 prov2 + \beta_6 prov3 + \beta_7 prov4 + \beta_8 marriage + \beta_9 work + \beta_{10} job1 + \beta_{11} job2 + \beta_{12} job3 + \beta_{13} job4 + \beta_{14} job5 + \beta_{15} job6 + \beta_{16} job7 + \beta_{17} job8 + \beta_{18} job9 + \varepsilon \quad (1)$$

四、青年群体金融素养的特征与差异比较分析

1. 青年群体金融素养的主要特征

金融知识方面,群体内部的离散程度较小,青年群体在利率计算、通货膨胀计算以及投资风险判别等衡量基础金融素养问题的正确率较高,而在针对股票、债券、基金等概念理解进行提问的高等金融素养问题的正确率较低。针对金融素养的自评问题,整体来看青年群体的自信程度较高,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青年群体的金融知识储备比较完善。

金融技能方面,青年群体平均仅持有2只股票,普遍未持有债券、基金等其他金融产品。同时

在被询问到是否缺乏投资渠道时，青年群体部分主观认为自己缺少渠道。就青年群体对于财经新闻的关注度来看，由于群体内部离散程度较高，青年群体对财经新闻的关注度并不统一，但基于相关指标的平均情况为接近每人关注一份财经新闻，青年群体对于财经新闻的关注度相对一般。

金融行为方面，青年群体具有一定的购买金融产品的经验，部分群体拥有股票账户或持有基金，但整体比例较低，同时对非公开市场交易的股票或基金进行交易的数量也较少。以上指标说明青年群体的金融行为存在不足，缺少实际操作的经验。然而青年群体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进行理性的金融行为。

金融态度方面，青年群体普遍认为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并在风险投资问题上更倾向选择低成本、低回报的投资项目，说明青年群体的风险偏好较低。此外，青年群体对于风险行为的回报期望较高，侧面说明其在进行风险投资时更加保守。

2. 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金融素养的差异比较

金融知识维度上，针对基础性的知识回答，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正确率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青年群体的正确率普遍高于其他群体；同时在测量答题者主观认知的相关问题上，青年群体也较其他群体更为自信，具体表现为当被询问“对股票、债券、基金的了解程度”时，青年群体主观认为自己更加了解上述金融产品。总的来说，就金融知识这一维度来看，青年群体总体表现优于其他群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年与老年群体的金融信任度更低^[25]，极易形成对金融知识的主观排斥；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以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与投资风险认知为代表的金融知识维度下的金融素养^[26]，而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平台的主要使用者自然占据相对优势。

金融技能方面，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持有的金融产品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青年群体持有债券更多，但持有的股票和基金更少，资产多样化的配置情况有待完善，这背后可能是由于受到社会资本积累较少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相比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实际拥有的金融产品购买渠道和财经信息收集渠道更多，这表明去除社会资本积累优势，其他群体在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化上仍旧弱于青年群体。

金融行为方面，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在测量“是否炒股”“是否持有基金”“是否持有其他金融理财产品”和“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度”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青年群体相比于其他群体，其拥有股票账户或持有基金的人数更多。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在实际的金融行为方面表现更佳，而在其他测量上的得分均高于其他群体。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在实际的金融行为中更加敢于尝试，并且对金融信息的关注度更高，这些金融行为都是高金融素养的外在表现。

金融态度方面，在测量个人风险意识的问题中，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在0.05水平上依然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青年群体更加具有风险意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个体的风险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可以推测，更高的金融素养有助于人们正确解读金融信息，基于风险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应对行为并从中获利。

综合来看，通过对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青年群体在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

行为与金融态度四个方面均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进一步从整体维度综合比较两个群体的金融素养，我们又对样本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利用预测的因子得分与旋转后得到的因子权重最后得到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其中的总样本数为2832，样本的金融素养综合得分的平均数为-0.183^①，标准差为0.181。为验证假设1，我们分别对7个虚拟变量的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表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F1	拥有的其他金融产品	0.0958
	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渠道	0.9666
	是否持有基金	0.9682
F2	持有多少只股票	0.8068
	关注财经新闻渠道	0.3581
	开通股票账户之后，是否有炒股经历	0.9074
	您家是否是您在炒股	0.8922
F3	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渠道	0.9814
	目前您家是否有金融理财产品	0.9809
F4	拥有债券类型	0.9041
	拥有的其他金融产品	0.8923
F5	股票基金风险比较	0.3563
	关注财经新闻渠道	0.4526
	两类彩票选择	0.7033
	财经信息关注度	-0.5418
	投资风险收益选择	-0.6196
F6	100元年利4%本息计算	0.6931
	年利5%通胀3%百元存一年后价值	0.6294
	股票基金风险比较	0.4612
	关注财经新闻渠道	0.3191
	两类彩票选择	-0.276
	财经信息关注度	-0.4243
F7	受访者是否认为投资多种金融资产风险小于投资一种金融资产	0.7894
	是否同意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说法	-0.7745

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等于所有因子得分与因子权重的乘积的累计值，而样本的因子得分存在一定比例的负值，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故没有删除，因而导致金融素养的综合得分为负值。同时，本文计算的青年群体金融综合素养只是一个相对性指标而非绝对性指标，其他群体金融素养综合得分为-0.25，因此相较于其他群体的金融综合素养来看青年群体仍然具有优势。

就虚拟变量方面来看,青年群体在虚拟变量5、6、7上面与其他群体在0.0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青年群体的得分高于后者。通过对公共因子进行因子旋转,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虚拟变量的经济意义,并对群体间金融素养的差异进行更加细致的描述。虚拟变量5主要影响“受访者是否认为投资多种金融资产风险小于投资一种金融资产”“关注财经新闻渠道”“两类彩票选择”这三个变量,可见虚拟变量5主要作用于个人的金融知识获取渠道以及与风险相关的知识与意识。虚拟变量6主要影响金融知识指标与“关注财经新闻渠道”,可见虚拟变量6主要正向影响个人的金融知识与其获取渠道。同时,虚拟变量6对金融态度指标与“财经新闻关注度”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青年群体持有的较高金融知识储备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金融素养,也会对高风险行为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虚拟变量7主要正面影响了“受访者是否认为投资多种金融资产风险小于投资一种金融资产”并负面影响了“是否同意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说法”,由此可见青年群体的金融态度相对更加保守。青年群体在虚拟变量3、4上同样与其他群体在0.05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青年群体的得分要低于其他群体。由表3可见,虚拟变量3、4主要反映个人的投资状况,由于其他群体主要包括中年群体与老年群体,更多的社会资本积累意味着其他群体相对青年群体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能够进行更加多元的金融行为。最后通过对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金融素养综合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青年群体依旧在0.05水平上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差异,总体来看青年群体的整体金融素养水平更高,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1。青年群体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金融知识的储备量更多、获得知识的渠道更广以及更加保守可控的风险意识,而其劣势主要体现在由于社会资本较少导致的金融行为欠缺。

3. 青年群体内部Y世代与Z世代金融素养的比较

类似地,我们依据前述方法,对青年群体内部Y世代与Z世代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其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就金融知识这一维度而言,针对“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和投资风险”这三个问题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Y世代更赞同投资多种金融资产比投资某一特定金融资产的风险更小的说法,因此也更倾向于通过增加资产配置多样化程度来规避风险。

金融技能这一维度上,在持有金融产品、投资渠道、关注财经新闻渠道这几个问题存在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Z世代持有的金融产品相对更多,且认为自己更不缺乏投资渠道,同时关注财经新闻的渠道也更加多元,这可能是因为Z世代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逐渐成长的一代,作为与信息时代紧密相关的“数媒土著”,他们受到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的深刻影响,往往更善于依托网络平台等多重途径进行信息获取与产品购买。

金融行为方面,Y世代相比于Z世代拥有股票账户、有炒股经历、真正在炒股的人更多,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Z世代,Y世代因其年龄优势,拥有更多的社会阅历与可支配的时间与资本,更易进行炒股等相关的金融活动。

金融态度方面,Y世代对财经信息的关注度更高,可能是由于工作之后需要对相关信息保持关注,而Z世代更愿意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可以看出他们在投资选择上态度更为开放。

综合来看,依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Y世代与Z世代在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这四个方面差异较小,仅在少数题项指标上存在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由于具有显著差异的题项指标过少,因而此处无需借助因子分析展开进一步的综合得分比较。整体来说,Y世代的金融素养水平比Z世代略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2。

五、青年群体内部金融素养的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青年群体内部金融素养的具体情况,我们聚焦于青年这一特定群体,以因子分析法建构成的金融素养整体指标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所在地区、婚姻状况、所在行业、单位类型这些变量为自变量,依据多元线性回归的基本方法,探究前述变量对青年群体金融素养影响的显著性情况及其具体的作用路径。

表4 影响青年群体金融素养因素的OLS回归模型估计, CHFS (N=2465)

变量	回归系数
年龄	0.003*** (0.001)
性别 (男性=1)	0.034*** (0.007)
教育年限	0.018*** (0.001)
户口类型 (非农户口=1)	0.045*** (0.008)
所在地区 (中部=1)	-0.019* (0.008)
所在地区 (东北=1)	-0.051*** (0.010)
所在地区 (西部=1)	-0.013 (0.008)
婚姻情况 (已婚=1)	0.009 (0.010)
所在行业 (与金融相关的职业=1)	0.084*** (0.016)
单位类型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	-0.026* (0.013)
单位类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0.021 (0.015)
单位类型 (集体企业=1)	-0.037 (0.028)
单位类型 (个体工商户=1)	0.007 (0.010)
单位类型 (私营企业=1)	0.007 (0.010)
单位类型 (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1)	0.018 (0.023)
单位类型 (其他类型企业=1)	-0.005 (0.033)
单位类型 (耕作经营承包土地=1)	-0.003 (0.014)
单位类型 (其他=1)	-0.006 (0.018)
截距系数	-0.540*** (0.029)
R^2	0.229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根据表4中显示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对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进行具体的异质性分析。年龄变量对青年金融素养的影响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个体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充裕的资金投入金融市场，并在实际的金融行为中不断积累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此外，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的增加也可以弥补由于普遍存在的消费者行为偏差带来的金融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偏差^[3]，最终使金融素养水平得到提升。

性别因素对青年金融素养有0.001水平上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男性青年比女性青年在金融素养上更占据优势，这可能是因为男性的理性思维和对数字敏感性相对较强，其在获取知识和参与金融市场方面也更具主动性。然而随着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女性受教育与就业权利的有力保障，这种差异情况或许在今后发展中得到改善。

教育年限对青年金融素养具有0.00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素养水平越高。这是由于教育水平能够增强青年对金融领域相关概念的理解能力，有助于其正确使用金融产品及服务^[3]，同时充足的受教育经历也利于增强青年的判断力与思考力，帮助其强化风险应对、有效规避金融困境，减少个体的金融脆弱性。

户口类型对青年金融素养的影响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拥有城镇户口的青年比农村户口的青年金融素养更好，即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城乡分化。这可能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相比于农村，城市能够提供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与更为发达的金融平台，金融机构网点遍及各处，金融覆盖率较高，有利于青年群体及时获取金融领域的相关信息与产品服务，由此呈现出更高的金融素养水平。

基于对全国各省份进行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的划分方式，依据回归统计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东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参照，居于中部和东北的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显著更低。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东部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金融机构的广泛分布与文化宣传营造出良好的金融氛围，能够有效引导青年了解金融知识、增加金融参与，利于进一步提升其金融素养水平。

从事金融相关职业更便于青年群体接触金融领域的信息与产品，对提升金融素养具有0.00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影响。就单位类型而言，由于该题项包含多个虚拟变量，但回归结果显示，仅有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从业经历会对金融素养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其他单位类型均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相较于其他单位而言，工作内容相对单一，不利于青年金融素养的提升。

除此之外，与前人研究中强调已婚人士金融素养水平更好的结论不相一致，回归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并未对青年群体金融素养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不同研究样本选择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结论偏差，本文聚焦于青年群体展开具体探讨，而既往文献多从一般性视角对覆盖各年龄阶段的全体人员进行整体研究。

总的来说，在本文的研究场域下，借助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我们最终发现，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所在地区、所在行业与单位类型均会对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产生显著影

响，且其作用路径与既往文献中普遍的研究结论较为符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假设3。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群体，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资料，借助独立样本t检验、因子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青年群体金融素养水平的实际评估、青年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比较、Y世代与Z世代的比较、青年群体内部异质性情况分析，以此对数字时代下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形成较为全面的认知。综合实证分析的情况，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预设的三个假设，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性视角进行综合评估，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水平有待完善，同时在金融知识、金融技能、金融行为和金融态度四重维度之间的比较中，其金融行为情况相对更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实现金融素养的有效提升。

第二，依据差异性视角展开基本比较，从青年群体外部来看，青年群体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与丰富的社会经验，在不断积累金融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能够顺应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相较其他群体金融素养更好，在金融素养内含的多重维度上占据一定优势；而从青年群体内部来看，以1995年出生为界限划分的Y世代与Z世代金融素养整体情况差异较小，Y世代由于年龄较长，拥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而Z世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具有更加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但综合来说Y世代的金融素养水平略高于Z世代。

第三，借助异质性视角进行具体分析，青年群体金融素养受到年龄、性别、教育年限、户口类型、所在地区、所在行业与单位类型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且其作用机制大体符合既往文献的研究结论，即年龄较长、性别为男性、受教育年限较高、拥有非农户口、居于东部地区、从事与金融有关的行业等情况均会对增强金融素养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进行工作可能由于与金融信息的相对隔绝，不利于金融素养的提升。

一方面，依据前述研究，从比较性维度来看，青年群体在学习技能与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优势，相较于其他群体而言，其金融素养相对较好，但仍具有一定不足，在金融素养内含的多重维度上均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背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深度赋能，金融行业转型升级，逐渐迈入数字时代，数字金融在提供普惠化、便利化优质服务的同时，也对金融素养较为欠缺的群体提出新的挑战。而青年群体具有互联网使用与金融素养方面的相对优势，其金融素养的进一步提升或能为当下数字金融的创新进程予以重要推力，其金融文化宣传的责任承担也能促进普惠金融的有效推广。

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尝试作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性讨论：

一是将提升金融素养纳入政策范围，从制度层面强化公众的金融意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创新驱动^[26]，而金融发展前景与以青年为典型代表的社会民众的金融素养情况密切相关。因此针对当下国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情况，国家应当积极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将提升国民金融素养置于战略层面的发展目标，设置专业部门保障政策落地与实

践监管,为开展金融教育、强化金融意识等具体措施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也为社会经济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二是完善课堂内外的金融教育,与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实现有效互惠。在信息技术与金融行业深度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金融教育作为提升公众金融素养的有效手段,在接续既往传统的同时,也应充分挖掘数字时代的可能优势为其赋能,最终以其自身的丰富完善为数字金融的深刻变革给予推力。一方面,就开展金融教育的实际场域来看,针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Z世代金融素养有待提升的情况,应当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定制金融课程的相关实践,推动金融教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利用学校课堂的有力平台,借助标准化的教辅资料、规范化的课程设计,全面促进该群体的金融素养提升。而在课堂之外,也应当通过开展持续性、日常性的金融素养教育,除了传统的发送传单、现场讲解,还可以依托于数字传播平台打破既往的空间限制,通过传播金融相关视频等方式,鼓励青年等各类群体积极学习金融相关知识,形成金融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就金融教育的具体内容来说,传统金融教育主要涵盖货币、外汇等基础知识,内容相对简单与有限,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金融教育的内容也应进行相应的丰富完善,扩充在移动支付、金融服务外包等新型金融领域的知识与技能,由此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金融行业的深刻变革。

三是积极呼吁青年群体的责任承担,增强金融知识与金融服务的普惠化程度。除了宏观的政策制定与官方的金融教育,日常生活中具有针对性的定点帮助同样重要。教育程度较低者、乡村居民、老年人等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群体极易在金融市场上遭受冲击,面对此种情况,青年群体作为金融素养与互联网技术相对较好的优势群体,或能成为帮扶弱势群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在通过各种新兴渠道主动学习金融知识、不断增强个体金融素养的同时,青年群体还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参与金融宣传志愿活动、向身边群体普及金融知识等多重途径,帮助他们更好地做出金融决策、提升金融素养,真正实现“带动家庭、辐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普惠金融的有效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银行.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EB/OL]. (2021-09-03)[2021-12-20].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32765/2021090315425154429.pdf>.
- [2] LUSARDI A, O.S.MITCHEL.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Literacy: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4 (1): 5-44.
- [3] 刘国强. 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现状研究——基于2017年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 [J]. *金融研究*, 2018(3): 1-20.
- [4] 朱涛, 钱锐, 李苏南. 金融素养与教育水平对家庭金融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纵横*, 2015 (5): 85-93.
- [5] 廖理, 初众, 张伟强.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与活动的定量测度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7): 43-64.
- [6] CAMPBELL Y. Restoring Rational Choice: The Challenge of Consumer Financial Regul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5): 1-30.
- [7] 胡振, 臧日宏. 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影响研究——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证据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 (2): 72-83.

- [8] DELAVANDE A, ROHWEDDER S, WILLIS R. Preparation for Retirement, Financial Literacy and Cognitive Resources [J]. Working Papers, 2008.
- [9] AGARWAL S, AMROMIN G, BEN-DAVID I, et al. Learning to Cope: Voluntary Financia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Loan Performance During a Housing Crisi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 [10] HAIYANG, CHEN, et al. An Analysis of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 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 1998.
- [11] ROOIJ M V, LUSARDI A, ALESSIE 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2): 449-472.
- [12] DORIANA C, PAOLO T, MARIANGELA Z. Financial Literacy: The Role of the Local Context [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2019 (4): 1874.
- [13] KEHIAIAN S E. Factors and Behaviors That Influence Financial Literacy in U.S. Households [J]. Dissertations & Theses Gradworks, 2012.
- [14] LUSARDI A, MITCHELL O S.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for Retirement Wellbeing [J]. Cerp Working Papers, 2005 (1): 34-37.
- [15] KLAPPER L F, LUSARDI A, PANOS G A.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2.
- [16] SPATARO L, CORSINI L. Endogenous Financial Literacy, Saving,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 2017 (2): 135-162.
- [17] 王宇焘, 范浩. 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5 (3): 70-75.
- [18] CLARKE M C, HEATON M B, ISRAELSEN C L, et al. The Acquisi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J].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2005 (4).
- [19] KARA, I.E.& T.D.KUGU. Determining Advanced and Basic Financial Literacy Relations and Overconfidence and Informative Social Media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urkey [J].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2016 (6): 1865-1891.
- [20] SOHN S H, JOO S H, GRABLE J E, et al. Adolescents' Financial Literacy: the Role of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Agents, Financial Experiences, and Money Attitudes in Shaping Financial Literacy among South Korean Youth. [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2 (4): 969-980.
- [21] 周晓春, 邹宇春, 黄进. 青年的金融风险、金融能力和社会工作干预 [J]. 青年研究, 2019 (3): 69-81.
- [22] 阮瑞草, 刘丹, 李苏南. 大学生金钱态度、金融素养与金融教育研究 [J]. 时代金融, 2015 (15): 175-177.
- [23] 高远, 孙奇琪, 孙兆明. 大学生金融素养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J]. 对外经贸, 2021 (2): 132-135.
- [24] 王永雄. 中国“Z世代”青年群体观察 [J]. 人民论坛, 2021 (25): 24-27.
- [25] 郑路, 徐旻霞. 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21 (6): 133-151.
- [26] 钟京东, 秦雪征, 刘冲. 互联网使用、金融素养与金融决策——基于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研究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1 (11): 68-78.

(责任编辑: 罗飞宁)